

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化及其影响^{*}

□ 郑先武 薛 亮

〔提 要〕 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化及其向全方位战略协作升级，被认为是三国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三边合作机制化旨在通过对接美日、美菲同盟和日菲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三国战略协同，以打造“印太战略”和“一体化威慑”新前沿。但三边合作机制化的深入发展面临诸多制约，主要来自三国国内政治因素和彼此优先事项分歧。尽管如此，三边合作机制化的网络越织越密，辅以美日菲澳四边机制，正成为企图阻止中国向海图强的军事协调中心。这将使中国运筹海上形势、统筹维权维稳及中国—东盟关系面临更多干扰因素。

〔关 键 词〕 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化、南海、军事威慑、经济安全

〔作者简介〕 郑先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薛 亮，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D87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 (2024) 4 期 0037-22

2024 年 4 月，美日菲三国领导人在美国白宫会晤，共同宣布将三边关系提升为所谓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最前沿的伙伴关系，并决心推进三边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东南亚次区域合作与区域格局演变研究”（22ASS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防务和经济安全合作。^[1] 此次峰会试图深化涵盖外交、军事和经济等领域的印太总体战略协调,力促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化,被认为是“历史性的创举”。^[2] 美日菲力求将原有的三边合作活动整合到机制化的三边全方位战略协调中,并通过深化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合作促使该机制企稳发展。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大步推进及相关小多边安全机制的接连更新,其剑指南海和台海、强化对华威慑、修正区域秩序的意图昭然若揭。在此情况下,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愈益扮演“内引外联”的关键角色,即一方面将美日引向南海和菲律宾群岛,重塑“第一岛链”,另一方面与印太其他小多边机制和域外行为体联动,以此全面强化所谓“印太安全架构”。因此,探究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化的表现、原因、影响和制约,有助于研判美国联盟体系搅动亚太安全格局的新动向和未来走向。

一、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化的表现

拜登政府力促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化,试图汇聚三方预期,形成一套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以便其可以在中长期内相对稳定地围绕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中心的所谓“潜在冲突的前线”,打造“印太战略”的新前沿。

（一）全面融会三国的印太愿景，打造三边合作机制化的规范引领

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化的深层次基础在于三国区域安全观的趋同。在美国的主导下,南海问题的升温提供了实现此种趋同的现实条件。冷战结束后,域内国家多认同和平、繁荣、稳定与安全的亚太区域秩序,其中,部分美国盟国更倾向于“美国治下的和平”,包括美国联盟体系主导下的所谓法治以

[1] The White House, “Joint Vision Statement from the Leaders of Japa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11,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4/11/joint-vision-statement-from-the-leaders-of-japan-the-philippines-and-the-united-states/>.

[2] The White House, “Readout of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s Call with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Eduardo M. Año of the Philippines,” April 1,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4/01/readout-of-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s-call-with-national-security-advisor-eduardo-m-ano-of-the-philippines-2/>.

及关键航道的“自由航行”等。^[1]21世纪初，恐怖主义一度成为美日菲所认知的共同威胁。因此，当时的三边合作主要集中在反恐、执法和情报收集等事务上，形态相对松散。然而，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亚太联盟体系逐步以南海、台海和东海等议题为抓手，生产和扩散“中国威胁论”“自由开放的印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试图以此动员域内国家一道制衡中国。^[2]尤其是自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联盟体系利用南海问题“自我实现”其威胁认知与秩序愿景，使南海问题成为构建小多边安全机制的主要动能。在此背景下，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确立了应对“南海威胁”和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法庭的国策。^[3]随之，美日菲的合作主题开始从应对恐怖主义转向在中菲南海争端中支持菲律宾，三国涉南海和中国的区域安全观开始趋同。

杜特尔特时期，尽管特朗普政府通过一系列举措回调了一度受到冲击的美菲关系，但由于菲律宾推行专注解决国内安全问题和谨慎对待南海争端的内外政策，两国战略对接有限。即便如此，这一阶段的美日对菲安全援助已使得三国就南海议题和三边合作积累起一定的政治共识。继而，在菲律宾国内安全形势趋于稳定和小马科斯政府掌权后，南海问题得以与所谓“中国威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自由开放的印太”等观念全面绑定。以美日菲联合少数域外国家不断炒作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为标志，南海问题成为扩散和强化上述区域安全观、为之披上法治外衣和推动三边合作机制化的关键抓手。^[4]2023年8月，小马科斯政府出台《2023—2028年国家全政策》。该战略文件关于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1]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ce White Paper 2009,”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 May 2, 2009, https://www.defence.gov.au/sites/default/files/2021-08/defence_white_paper_2009.pdf.

[2] 朱翠萍：《“印太”：概念阐释、实施的局限性与战略走势》，《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5期，第1-8页。

[3] Benigno S. Aquino III, “Second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July 25, 2011, <https://www.officialgazette.gov.ph/2011/07/25/benigno-s-aquino-iii-second-state-of-the-nation-address-july-25-2011-en/>.

[4] 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等：《南海仲裁案裁决再批驳》，南海之声，2024年7月11日，<https://vscs.cri.cn/20240710/b40d62ce-e38b-b103-4c4e-20bf3310d530.html>。

等表述与美国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国防战略》及日本“安保三文件”相关表述如出一辙，标志着三国共享的区域安全观正式形成。^[1] 三国区域安全观的趋同，为三边合作机制化奠定了规范基础。

在共同的原则和规范引领下，三国寻求在国内动员更广泛的支持，在国家间调动更多协同精神，并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获取更广泛的认可。为此，三边讨论并不局限于南海，而是不断扩展到印太地区，宣示三边合作对促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的重要性。2024年4月召开的系列高层会议，一方面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对中国在仁爱礁和钓鱼岛的正当维权行动表达关切，宣称三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对于维护包括东海和南海在内的海洋自由和促进国际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其声明范围远远超越南海和东海，甚至共同强调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的“威胁”，重申“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无端指责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行动以及对台姿态继续“对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构成威胁”。这也表明，美日菲三边合作的指向绝不局限于南海，而是覆盖东海、台海、日菲本土岛群等“第一岛链”及与澳大利亚和“第二岛链”联动，作为“印太战略”和“一体化威慑”的重要一环。^[2] 在此意义上，2024年4月美日菲峰会的召开及其对三国共同区域安全观的全面表述，标志着主要围绕南海的三边防务政策对话正式升级为全方位“印太战略”协调机制。

（二）基于共同原则和规范引领，打造三边多层次决策协调机制

与三国共享的区域安全观的形成过程相一致，早期的三边合作活动集中在美日协调对菲发展援助、协助棉兰老岛反恐以及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在南海争端发酵后，协调对菲海事能力建设援助、提高菲海域感知能力以及

[1] Philippin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2023-2028,” August 2023, https://nsc.gov.ph/images/NSS_NSP/National_Security_Policy_Manual_FINAL_E-COPY_with_WATERMARK_140823.pdf. 另据笔者统计，菲律宾《2011—2016年国家安全政策》表述东盟达20余次；《2017—2022年国家安全政策》和《2018年国家安全战略》论述东盟达10余次；新版国家安全政策仅提及东盟2次。

[2] 郑先武：《“美日菲三边架构”：美国打造印太战略新前沿》，《当代世界》2023年第7期，第50-55页。

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成为重点事项。特朗普时期，三国举行“海上训练活动”“海上战士合作”“肩并肩”联合军演，并在其他多国军演中参与交流。直至小马科斯执政后，三国于 2022 年 9 月召开三边防务政策对话，并敲定在海洋安全保障、海域感知、网络安全、信息共享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合作，使三边合作进入新的机制化阶段。^[1]

具体而言，三边合作的机制化主要体现在由三边峰会、部长级和副部长级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军方参谋长和参谋部会谈、防务政策对话、三边海事对话及立法机构协商等组成的多层决策协调机制的逐步建立。这一机制负责协调部队访问和互惠准入、国防装备和技术转让、海域感知和情报共享、“灰色地带”行动及三军联合演习、联合巡逻和海警演训等防务合作。同时，其涵盖供应链安全、基础设施发展、网络安全和数字经济、能源转型及粮食安全等经济安全合作，兼顾人道主义救援和科教合作等议题。其中，除 2024 年 4 月的三边峰会外，2023 年 9 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与小马科斯和岸田文雄的会议及相关双边会议都在领导人层面审议了加强三边合作的重点事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层面，2023 年 6 月和 12 月的国家安全顾问三边会议确立了三边防务与经济安全合作的领域并制定了行动计划；在部长级和副部长级会议层面，分别在 2023 年 7 月和 9 月举行的三边外长会议商议了合作议题并提出了工作计划，而 2024 年 3 月的首次三边副外长会议侧重于执行层面的优先事项磋商。与此同时，三国军方的会议更多地与澳大利亚联合，实现双边、三边和构建中的美日菲澳四边机制密切联动。例如，三国在 2022 年 12 月举行了首次三边陆军高层会议、2023 年 4 月的三边陆军及海军陆战队高层会议、2023 年 6 月的三边武装部队参谋长会议。随之取得进展的是，三国联合澳大利亚，举行了 2023 年 6 月的首次四国防长会议、2023 年 8 月的四国指挥官会议、2023 年 11 月的四国联合参谋部会谈、2023 年 12 月的四国陆军参谋长会议以及 2024 年 5 月的第二届四国防长会议。在这些部署下，三国

[1] 「日比米防衛実務者協議の開催について」、防衛省、2022 年 9 月 15 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exchange/area/2022/20220915_usa_phl-j.html。

及与澳方的联合军事演训行动也不断更新和扩容，近期更是以多国联合南海演训为标志，增强在关键海域的操练和对华威慑。

（三）三边合作活动更加规范化，愈益在“第一岛链”扮演关键角色

最为直接的动向是，在南海展开协调性攻势并使其常态化，合力对中国强加更高的军事、外交和声誉成本。一方面，通过增强菲武装部队海空力量和海警的综合能力及多方联合部署，维持南海攻势常态化和“国际化”。为此，美国向菲海警援建了技术教培中心、海岸监视系统和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的扩展设备，并加大对外军事融资，为菲提供用于南海的雷达、无人机、军用运输机以及沿海和防空系统。^[1]日本为菲海警提供主要船只，构成对抗中国的主力，并更新菲卫星数据通信系统，预计在2027年向菲再交付5艘大型船舶。^[2]在提供防务设备基础上，美日定期为菲海警组织联合训练，并举行三边海警演习，提升三国海警间的互操作性。同时，通过以美日菲为主的多国联合演习及南海联合巡逻，增强在南海的军事互操作性和集体威慑力。这包括美国航母参加的南海“海上合作活动”、美国轰炸机参与的南海联合空中巡逻、投入美日澳先进装备在南海进行的四国海上演习、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齐心协力”演习以及操练通信和无人系统的“海上战士合作”演习等。而正是在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化后，菲律宾才敢于将多国南海联合巡逻和集体航行安排在巴拉望岛西部12海里以外的争议海域进行。其标志性事件是，美日菲联合澳大利亚在南海开展四国演习，并从2023年8月将在所谓“领海”进行的“海上再补给和取证”活动，升级为2024年4月在所谓“专属经济区”进行的“海上合作活动”。该行动由四国防长集体背书，强调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航行和飞越自由”、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等。基于此类规范引导和军力展演，菲律宾试图与域外大国共同推行覆盖“全部领土和专属

[1] “Trilateral Meet to Capacitate PH with Credible Defense Posture in WPS,” Philippine News Agency, April 12, 2024,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222486>.

[2] Josiah Gottfried, “The Philippine Coast Guard’s Modern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int Effort,” March 5, 2024, <https://www.csis.org/blogs/new-perspectives-asia/philippine-coast-guards-modernization-international-joint-effort>.

经济区”的“全面群岛防卫概念”，以“与别国加强合作与互操作性”，借力推进菲律宾的扩张性诉求。^[1]

另一方面，美日菲进一步通过外交、舆论和法理手段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实施“成本强加战略”。他们认为，应对中国的“灰色地带”策略，不仅涉及务实行动，还取决于有效的信息共享与传递，以维持公众支持、团结国际社会，并防范中国“分化三国”。^[2]因此，三国发表对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歪曲言论，通过加强立法做实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并操练“信息战”。三国通过双边和三边合作对菲海警执法、通信、摄影和宣传等方面进行培训，再以舆论资源配合由菲国防、国安和外交部门组成的“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组”下设的信息工作组，制度化地处理和公布这些针对中国的信息；进而以联盟和伙伴国家掌控的媒介为平台，形成“污名化”中国的舆论攻势。^[3]同时，在法律方面，美日通过立法机构人员交流访问和培训支持菲国会和议员，企图不断合法化甚至复刻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在“舆论和法理优势”加持下，菲大力推进“灰色地带”行动，更新国内法和相关政令，命令海警和渔业水产资源局船只在黄岩岛等岛礁附近定期轮换部署，向菲渔船供应物资、部署人员闯滩登岛，并计划在美日支持下掌控“专属经济区”。

比在南海的筹划更为隐蔽的是，三国着重改善以中国台湾岛为中心的防御态势。美国认为，日菲两国的基地和准入协议使美军能够在该地区投射力量，并提供关键的美军集结地。日本在“协防台湾”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而“在台海冲突初期击退中国军队的场景中，能够使用菲律宾的跑道和飞机燃料至关重要”。^[4]由于担心菲律宾无力应对冲突，美日着力于“保障从菲领土的

[1] “Teodoro: Multilateral Drills Part of PH’s Ongoing Defensive Shift,” Philippine News Agency, April 9, 2024,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222302>.

[2] Gregory B. Poling and Japhet Quitzon, “Sustaining the US-Philippines-Japan Triad,” CSIS, February 12,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ustaining-us-philippines-japan-triad>.

[3] “PH to Sustain Transparency in WPS Ops,” Philippine News Agency, February 13, 2024,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218781>.

[4] Becca Wasser, “How the US Courted the Philippines to Thwart China,” CNAS, November 29, 2023, <https://www.cnas.org/press/in-the-news/how-the-u-s-courted-the-philippines-to-thwart-china>.

对台行动能力”。一方面，共同加强菲律宾的防御体系，提升其指挥和控制、区域拒止、海域感知、防空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能力。近年来，美菲敲定了《安全部门援助路线图》，通过“超额防务用品计划”为菲海军提供长55米以上的巡逻炮艇，资助菲发展本土军工业，并洽谈“海马斯”系统及先进战斗机的援菲计划。此外，美菲正快速推进“军事信息总体安全协议”签署，为双边和三边的技术情报合作建立框架，这将有助于加强美国海上情报监侦能力，执行监测移动导弹目标及组织反潜战巡逻等动态任务，并强化“三海联动”的情报基础。日本自2023年7月放宽国防装备出口规定后，迅即于11月首次启动官方安全援助，向菲提供海岸雷达系统，同时通过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和官方发展援助，提高菲海事执法机构和“渔民”监测巴士海峡等咽喉要道的能力。美日正加快推进在海空力量以及后勤与维修等方面的联合军工项目，菲律宾将从中受益。^[1]由此，菲得以实施“新地平线III”国防现代化计划，提高领域感知、连通性、情报监侦能力。^[2]在三边合作机制化的推动下，菲日益对标中国台湾地区的“豪猪战略”，企图对中国形成“非对称威慑”。

另一方面，优化“第一岛链”整体军事部署、战备状态和对台湾的有利前沿态势。美国致力于扩大对日菲的准入，增强美军机动性、分散性和韧性，更新“第一岛链”总体指挥与控制体系。为此，美日计划发展联合军工、高超声速、空间感知等能力，在2025年建立日本统合作战司令部，并实现美日“无缝指挥控制链”。^[3]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附近强化防御，并拟在冲绳增派“滨海作战团”和部署防御系统和战备物资，以提高针对中国的海上拒止能力。与此相一致，美国将在关岛部署“滨海作战团”，使之成为对抗中国、防卫

[1] “PH to Reap Huge Economic Dividends from PBBM-Biden-Kishida Meet,” Philippine News Agency, April 10, 2024,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222362>.

[2] Joe Saballa, “Philippines OKs \$35B ‘Re-Horizon 3’ Military Modernization Plan,” The Defense Post, January 30, 2024, <https://www.thedefensepost.com/2024/01/30/philippines-military-modernization-plan/>.

[3] Dov S. Zakheim, “The Biden-Kishida Summit Should Set the Stage for a Unified US-Japanese Military Command,” The Hill, April 5, 2024, <https://thehill.com/opinion/national-security/4575664-the-biden-kishida-summit-should-set-the-stage-for-a-unified-u-s-japanese-military-command/>.

日菲的威慑力量。三方还通过美国主导、日本赞助、菲政府和军方内应的方式，大幅加强关涉台湾行动的菲基地建设和军事部署。重点是强化《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下的菲海空基地对台行动的后勤支持能力，包括后勤、运输、补给、维护及安全通信等方面的能力。^[1] 此外，接近中国台湾岛的拉尔洛、拉瓦格、巴丹岛等吕宋岛北部相关基地建设正快速推进。

美日菲还通过大规模、常态化和各有侧重的军演练兵备战，企图在西太平洋建立强韧的补给线和指挥控制网。为此，美军将太平洋多国联合战备中心迁往菲律宾，作为盟国联合培训的移动基地。其中，作为旗舰项目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正从战术层面演变为作战层面，其 2024 年的演练科目包括海上安全、传感和瞄准、防空和导弹防御、动态导弹打击、网络防御和信息战等，地点择定靠近中国台湾岛的菲巴丹省马武里斯岛。^[2] 其他重要联合演习有：三国参与的关涉海岸侦查、反潜、水面和空中作战及海域感知的“海上训练活动”和“齐心协力”演习，主要在菲律宾克拉克、巴萨和其他空军基地及北吕宋岛军事区举行的“雷霆对抗”空军演习以及美国首次在吕宋岛北部部署“堤丰”中导系统的“坚盾”陆军演习等。基于此，在 2024 年 7 月日菲《互惠准入协定》签署后，美日菲澳将在各自领土范围内集体训练，提振联合演习及作战训练的深度和密度。借此，美国谋图削弱中国的反介入 / 区域拒止能力，并强化“一体化威慑”战略。

二、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化的动因

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的成形，既是三国政府在国际和地区格局变化下基于所谓威胁认知作出的政策调整，也是三国彼此间双边关系长期发展的结果。

[1] “US, PH Defense Execs Meet, Discuss Ways to Enhance Logistics Capabilities in EDCA Sites,” Philippine News Agency, March 18, 2024, <https://www.dnd.gov.ph/Release/2024-03-18/2113/US,-PH-defense-execs-meet,-discuss-ways-to-enhance-logistics-capabilities-in-EDCA-sites/>.

[2] “Northern Luzon Areas Eyed as Venue for ‘Balikatan’ 2024,” Philippine News Agency, February 12, 2024,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218655>.

对于美国而言，这是其发起“印太安全架构”和对华威慑举措的最新延伸。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基于双边联盟先后构建起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澳、美英澳等小多边安全机制，谋求以网络化的安全架构实现分摊战略成本、稳固联盟体系、施加集体威慑等目标。这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体现为“亚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即超越既有联盟，将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三边和多边关系编织在一起，以在更远的距离、更省力的情况下做更多的事情”。^[1]随着对华战略遏制的升级，美国政府确立了要“抵消中国在‘第一岛链’的空海主导地位并统治‘第一岛链’外的所有领域”的战略目标。^[2]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遂进一步将亚太安全网络发展为“印太安全架构”，并将美日菲三边机制打造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更加重视盟友和小多边机制的作用，在外交、经济、军事乃至区域治理议题上多管齐下，对华展开全面战略竞争。^[3]

具体到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美国有意通过该机制利用日本在区域安全事务中的自主能力，影响菲律宾关涉关键海域的立场，并将其彻底纳入“印太安全架构”。美国企图借此优化在“第一岛链”威慑中国的“成本—效益”结构。美国认为，日本可以成为有力参与者，因为日菲伙伴关系相对于美菲联盟更不容易受到政治冲击。因此，三边机制可以敦促日菲进一步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和各自军力，向中国施加集体政治、经济和军事成本。^[4]鉴于“美日同盟已将台海安全作为战略目标”，而菲律宾仍存在不确定性，该机制可

[1] Secretary of Defense Ash Carter, “Remarks on ‘Asia-Pacific’s Principled Security Network’ at 2016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4, 2016,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791213/remarks-on-asia-pacifics-principled-security-network-at-2016-iiiss-shangri-la-di/>.

[2]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ebruary 2018, Declassified in January 2021,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1/01/IPS-Final-Declass.pdf>.

[3] 韦宗友：《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及对中国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3期，第29—33页。

[4] Gregory B. Poling and Andreyka Natalegawa, “Building a US-Japan-Philippines Triad,” February 1,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uilding-us-japan-philippines-triad>.

以进一步联合“前线国家”，为台海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做好准备。^[1]

对于日本而言，这是其提升“正常和军事大国”地位和制衡中国的重要一步。整体而言，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从“重经济、轻军备”的“福田主义”向“普通大国”、“军事化”和积极强化自主防卫、美日同盟及战略伙伴关系的方向演进。^[2]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和东北亚局势的变化，日本认为其面临的安全环境正不断恶化，这一局面对于自安倍内阁以来的日本政府全面改革防卫态势、调整“美矛日盾”的配置而言，既是风险也是机遇。在此背景下，自安倍内阁始，日本便积极介入南海问题，成为影响南海事态的重要域外力量。^[3]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日联盟进一步“横向发展”，以建立新的印太联盟网络。

早在2019年11月，时任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即便对菲律宾防长表示，“日本愿意推动船舶和飞机停靠菲律宾港口，自卫队参加菲美联合演习等日菲美三边合作和高层会谈。”^[4]2022年12月，日本发布的《国防战略》规定，以包括国防能力在内的综合国力提升和同盟国、“志同道合”伙伴等密切作协调，加强威慑力和应对“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包括与菲律宾等达成《互惠准入协定》、《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国防装备与技术转让框架等。其《防卫力整備计划》特别强调与“志同道合”国家开展联合训练与演习、设备与技术合作、能力建设支持等事项。^[5]作为其延伸，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有助于日本巩固其防卫政策，进一步谋求正常和军事大国地位

[1] Gregory B. Poling and Japhet Quitzon, “Sustaining the US-Philippines-Japan Triad,” February 12,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ustaining-us-philippines-japan-triad>.

[2] 参见于铁军：《因应与调适：战后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化》，《日本学刊》2023年第4期，第1-38页。

[3] 参见朱海燕：《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向及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第126-138页。

[4] 「日フィリピン防衛相会談（概要）」、防衛省、2019年11月17日、https://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11623291/www.mod.go.jp/j/approach/exchange/area/2019/20191117_phl-j.html。

[5] 「国家防衛戦略について」、防衛省、2022年12月16日、<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strategy/pdf/strategy.pdf>，「防衛力整備計画について」、防衛省、2022年12月16日、<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plan/pdf/plan.pdf>。

及提升大国影响力。^[1]它还有助于稳定美国对日本及“第一岛链”的防卫承诺和投入，增强日本干涉台海事务的能力，并以“三海联动”减轻单方面压力和保障海上资源和能源要道。^[2]因此，岸田内阁致力于在已有印太布局基础上大力推进三边合作，以此赢取新的政绩。

对于菲律宾而言，这是其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试图侵占南海岛礁并稳定内政的一步险棋。早在冷战时期，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便对美国表示，在美国保持地区存在前提下，看好日本在地区军事安全中的作用，支持日本提高军事预算和修宪，但随即遭到美国的否决。^[3]近年来，大国竞争的形势给予菲律宾新“窗口期”，即通过不断深化的美日双边和迅速升级的三边关系提升自身国力和谋取在南海所谓“领土和专属经济区”。于是，自2011年起，菲律宾政府出于内外多重政治考虑，对南海争端的态度日趋强硬。^[4]其间，尽管认识到南海局势日益紧张，杜特尔特政府仍将国内安全问题视为“最高安全关切”。因此，其任内的三边合作较为有限，主要是从菲海岸警卫队和海域感知能力建设、菲军队现代化和联合演习以及菲南部自治区治理等方面展开。^[5]

然而，小马科斯政府继承了杜特尔特的国家安全遗产，强势推行“捍卫领土主权和主权权利”、加速菲武装部队现代化并实施《2023—2028年菲律宾发展计划》等政策。实施这些远超菲自身能力的系列政策亟需美日等国的共同支持。具体而言，菲律宾有意通过三边合作机制获得以美日为首的更为

[1] 项昊宇：《日本“安保三文件”初析：战略转型与前景展望》，《和平与发展》2023年第1期，第97页。

[2] Joe Gould, “China’s Neighbors Seek Expanded Partnerships with US to Deter, Defend,” *Defense News*, March 10, 2023, <https://www.defensenews.com/pentagon/2023/03/10/chinas-neighbors-seek-expanded-partnerships-with-us-to-deter-defend/>.

[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X, Southeast Asia, 1969-197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p.396.

[4] 鞠海龙：《菲律宾南海政策：利益驱动的政策选择》，《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79—87页。

[5] The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8,” Philippin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uly 8, 2018, https://nsc.gov.ph/images/NSS_NSP/NSS_2018.pdf.

制度化和深入的国际支持，以进一步落实“全面群岛防卫概念”，实施“新地平线 III”军事现代化计划，并“利用集体威慑来应对潜在生存威胁”。^[1]同时，小马科斯政府强调，“志同道合”国家应在国防和安全事务及经贸和投资等多方面加强伙伴关系。因此，在战略和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能源、关键矿产等领域减少菲律宾的脆弱性，成为三边合作的必要组成部分。^[2]

综合来看，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既是三国出于各自安全利益而构建对华威慑体系新的一环，也是三国规避同盟“被牵连”和“被抛弃”风险的战略选择。其中，在南海问题上，三国的立场和预期趋于一致。在台湾问题上，美日一致性更高，并试图共同塑造菲律宾的预期。当然，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形成离不开三国彼此间原有双边关系发展的稳固基础。尤其是，日菲战略伙伴关系和美菲同盟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三边合作开辟了空间并确立了初步的合作规范、程序和领域。

其中，美菲同盟关系总体上呈现螺旋上升的发展形态。冷战后，美菲同盟先后围绕反恐、南海和领土防御等主题形成愈益深入的安全合作关系。在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以来，以美国对菲防务承诺的加强、各级对话机制的创建、《21 世纪美菲伙伴关系联合愿景》等重要战略文件的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下军事基地的建设以及高频度军事接触等重大进展为标志，美菲同盟全面强化并决心“将两国合作纳入多边网络”。^[3]因此，拜登和小马科斯在 2023 年 5 月会晤时，强调对南海和台海的共同立场，并展望美日菲和美澳菲的三边合作模式。^[4]两位领导人宣布的《双边防务指针》优先考虑

[1] The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2023-2028,” Philippin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ugust 12, 2023, https://nsc.gov.ph/images/NSS_NSP/National_Security_Policy_2023_2028.pdf.

[2] “Zubiri Meets with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The Philippine Star, April 19, 2023, <https://www.philstar.com/headlines/2023/04/19/2259922/zubiri-meets-us-trade-representative>.

[3] Gregory B. Poling, “The US-Philippine Alliance’s Very Busy Month,” April 12,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philippine-alliances-very-busy-month>.

[4] 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Lead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 May 1,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01/joint-statement-of-the-leaders-of-the-united-states-and-the-philippines/>.

基于共同关心问题的三边和多边合作。其中，美菲正快速推进的“军事信息总体安全协议”，也是美日韩、美日澳等美国主导的三边安全机制得以有效运作的情报支柱，这将为深化双边和三边军事情报技术合作建立框架。

其实，日菲关系自21世纪日本突破“福田主义”以来便稳步发展。2001年9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借“9·11”事件将安全磋商纳入提升伙伴关系轨道。翌年，菲海警开始定期接待日本同行访问和对菲展开培训。2006年12月，安倍首相和阿罗约总统决定建立“近邻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推进关于安全和海事问题的政策对话。在南海问题发酵后，日菲安全合作加速，于2011年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设立讨论南海问题的工作组。此后，日菲于2016年强化战略伙伴关系，同意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并达成防务装备与技术转让协议。据此，菲获得日制多用途快速反应艇和空中监视雷达。同时，日菲在2015年至2021年期间举行了17次联合海军演习，并于2021年举行首次双边空军演习和训练。^[1]

作为双边合作制度化的标志，日菲于2022年4月首次举行外交和国防部长“2+2”会谈，宣布将缔结《互惠准入协定》和《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持续深化军事接触。日本表示，将继续支持菲加强海域感知、更新国防装备和技术、管理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包括对台海潜在危机的谋划。^[2]同年12月，日菲副部长级国防对话召开。这标志着日菲从工作层到部长级防务对话平台的全贯通。更为重要的是，该会谈“提出了加强菲日美三边防务合作的潜在想法”。^[3]这一想法在2023年2月的日菲领导人会晤后得到推进，两国宣布，

[1] CNAS US-Philippines Alliance Task Force, “Revitalizing the US-Philippines Alliance to Address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une 2, 2022,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revitalizing-the-u-s-philippines-alliance>.

[2] Kojiro Tonosaki, “Aiming for a Quasi-alliance: Building a More Robust Japan-Philippines Security Partnership,”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ly 27, 202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iming-quasi-alliance>.

[3] “Philippines, Japan Sustain Defense Partnership,” Philippine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13, 2022, <https://www.dnd.gov.ph/Postings/Post/Philippines%2c%20Japan%20sustain%20defense%20partnership/>.

致力于在经济、安全及地区和国际问题上加强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并通过与美国的三边对话加强防务合作。同时，促进经济安全合作，以抵制“经济胁迫”。^[1] 同年 11 月，日菲首脑会谈就缔结《互惠准入协定》及加强与美国的三边合作达成一致。^[2] 其中，被视为“准部队访问协议”的《互惠准入协定》在签署后将可以实现在各自领土上集体训练，从而为美日菲军事合作的升级注入新的动力。这些双边层面的进展为三边合作机制化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三、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化的影响及制约

当前，美日菲正在防务合作基础上快速推进在经济安全、涉台协调和区域接触上的综合性合作，以服务于在中长期内威慑和“竞赢”中国的战略目标。这将在短期内产生多重影响。

第一，在军事安全领域“内引外联”，推动筑牢印太“一体化威慑”架构。一方面，三边合作机制化有助于将美日力量引入南海和菲律宾群岛，加固以中国台湾岛为中心的“第一岛链”。这将增强对华前沿军事威慑和“规锁”，并基于三边军事情报合作推动“三海联动”常态化。另一方面，由于美日菲与澳大利亚先前已有深厚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三边合作机制化有望带动美日菲澳四边机制在军事领域快速发展。随着 2024 年 5 月第二届美日菲澳四国防长会议的召开，这一机制被正式命名为“SQUAD”以突出其军事威慑属性。^[3] 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也将基于双边联盟和小多边机制，密切联合其他伙伴，强化和链接“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在此基础上，其有望促成以美日、美澳同盟为基轴，美日韩“北翼”、美日菲“西翼”、美日澳“东翼”、美

[1] “Japan-Philippines Joint State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February 9, 2023,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457147.pdf>.

[2] 「日本とフィリピン 首脳会談 沿岸監視レーダー供与で合意」、NHK、2023 年 11 月 3 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31103/k10014246551000.html>。

[3] “Teodoro, Austin Huddle in Shangri-La Dialogue,” Philippine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2, 2024, <https://www.dnd.gov.ph/Release/2024-05-05/2147/Statement-of-the-SND-dated-May-5,-2024>.

英澳“南翼”和美日菲澳“中翼”相协同的西太平洋总体战备部署。

2022 年 3 月，美军印太司令部前任司令阿奎利诺曾公开确认，美军将关岛、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作为印太战区威慑中国和所谓“协防台湾”的四大重心。^[1] 同样，美日菲澳在 2024 年 7 月至 8 月召开的多场“2+2”会谈中，都将发展四国安全合作视为重点议题。^[2] 由此，继侧重东北亚的美日韩三边机制、侧重衔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及侧重先进技术合作的美英澳三边机制之后，美日菲澳实际上正成为试图阻止中国向海图强的军事协调中心。

第二，在经济安全领域打造“样板工程”，以经济手段支持战略和军事目标。三国要走向战略协调，经济成果清单是关键而非次要。因此，三边合作正着力加强其经济安全支柱，标志性举措是“吕宋经济走廊”的启动，被视为“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最具有雄心和潜在影响力的经济举措”。^[3] 美日助力菲战略和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寻求抵消“中国在菲重要公共服务领域的影响力”。就此，美日以公私协调的方式，为菲律宾的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电信设备等电力基础设施以及开放网络、通讯卫星和“星链”、海底光缆等数字基础设施联合投资。美日计划在网络 and 关键技术等方面向菲分享信息和经验，以“反制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数字监控”，与中国打“信息战”。

在贸易与投资方面，美国考虑与日本共同撬动中菲经济“压舱石”，以便菲领导人能够“抵制中国的经济胁迫”。^[4] 为此，美国派出总统贸易和投

[1] “INDOPACOM Identifies Four Priority Hubs to Deter China: Guam, Japan, Philippines, Australia,” Inside Defense, March 10, 2022, <https://insidedefense.com/daily-news/indopacom-identifies-four-priority-hubs-deter-china-guam-japan-philippines-australia>.

[2] “Joint Statement on the Philippines-United States Fourth 2+2 Ministerial Dialogu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30, 2024,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the-philippines-united-states-fourth-22-ministerial-dialogue/>.

[3] Christopher B. Johnstone and Gregory B. Poling, “A Tale of Two 2+2s: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CSIS, August 2,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ale-two-22s-japan-and-philippines>.

[4] “Trilateral Ties Could Reestablish PH Credibility on World Stage,” Philippine News Agency, June 29, 2023,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204607>.

资代表团并与菲共同主办“印太商业论坛”，表明菲是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的优先对象。美日对菲投资多集中在制造业、核能和清洁能源、粮食安全、矿产和电池生产及半导体等供应链方面，以降低菲律宾在危机中的脆弱性。同时，“印太经济框架”发挥共享信息和建立供应链预警以排挤中国的影响，菲是其中一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投资不乏准军事和战备指向。例如，在美国政府主持和日本财团资助下，苏比克和克拉克基地及附近设施成为美日重点投资对象，而连接它们的经济走廊也将在七国集团支持下不断升级。^[1]为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 2024 年 7 月专程访问了苏比克湾的海军基地和美国公司，评估其开发供美国海军使用的船舶维修设施以及维护印太地区伙伴国家船只的工业能力，这标志着其经济举措与战略目标的高度挂钩。^[2]

客观而言，这一经济安全支柱有可能对“一带一路”倡议、中菲合作项目造成冲击，并推动菲加入所谓排华“供应链联盟”。这将在主观上减少菲配合域外大国与中国抗衡的顾虑。以往，美日澳牵头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多集中在南太，如今打造“吕宋经济走廊”，显然要对东南亚和印太地区起到更多的示范效应。同时，菲律宾在其影响下愈益对美日等国取消特定行业外资所有权的限制但对中国投资加大安全审查，导致中国在菲企业不得不进行更多风险评估。

第三，发挥对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外交合力，扩展美国联盟体系的区域影响力。三边合作机制化将使美国联盟体系能够进一步融入亚太尤其是东南亚区域的核心议程。除以一系列美化自身言论试图赢得域内的支持和谅解外，三边合作亦重视通过话语策略和公共产品拉拢东盟及其成员国。为此，三国宣称本着“共同致力于自由开放的印太”的精神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及《东盟印太展望》和《蓝色太平洋 2050 战略》。在以往的合作中，美日注重联手

[1] “Strategic Landpower Dialogue: A Conversation with General Charles Flynn,” October 12,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trategic-landpower-dialogue-conversation-general-charles-flynn>.

[2] Christopher B. Johnstone and Gregory B. Poling, “A Tale of Two 2+2s: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加大对东南亚投入，并通过功能性合作重点诱拉海上东盟国家以南海问题牵制中国。^[1] 作为其延伸，三边合作机制化也通过联合军演及海警训练向该区域尤其是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开放观察和释放善意。^[2] 同时，在 2023 年开始通过“国际观察员计划”邀请东盟国家作为观察员参加“肩并肩”演习。2024 年 4 月，美日菲三边峰会借助“非法捕捞”等议题，宣称将与区域国家推进多边海域态势感知合作计划。^[3]

不应忽视，三边合作机制强调的“海上安全、信息共享以及人道主义救援”及“经济韧性”等领域，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长期议程存在交集。在后续发展中，三边合作机制很可能利用在国际法和国际规范、海洋安全议题及经济安全合作方面的交集，发挥对东盟影响的合力。加之，美日澳都在加快推进与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战略对接；^[4] 菲律宾也将于 2026 年再次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美日菲澳有意借助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和推进《东盟印太展望》落实的名义，共同影响东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在南海甚至台海等地区安全议题及“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上的立场，从而对中国管控南海的努力进一步施加压力。通过三边合作机制化，美国正试图填补其在东南亚的“战略缺口”，并对其他东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5]

与此同时，三边合作机制化的一个内在含义是三国愿意以相关原则、规

[1] 参见项昊宇、鲍志鹏：《美日在东南亚的联手拓展：战略协同与影响限度》，《国际问题研究》2023 年第 5 期，第 98-116 页。

[2] “US, Philippines Partner with Allies During Exercise Sama Sama 2023,” October 2, 2023, <https://www.pacom.mil/Media/News/News-Article-View/Article/3545630/us-philippines-partner-with-allies-during-exercise-sama-sama-2023/>.

[3] The White House, “Joint Vision Statement from the Leaders of Japa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11,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4/11/joint-vision-statement-from-the-leaders-of-japan-the-philippines-and-the-united-states/>.

[4] “Plan of Action to Implement the ASEAN-Austral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2025-2029),” July 27, 2024,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4/07/Adopted-ASEAN-Australia-POA-2025-2029.pdf>.

[5] Lucas Myers, “Filling in the Indo-Pacific Latticework in Southeast Asia,” April 4, 2024,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filling-indo-pacific-latticework-southeast-asia-us-japan-philippines-trilateral-summit>.

则和规范约束行为并相信其他国家将予以回报，从而在主体间趋同预期。^[1]在此意义上，由于美日在台湾问题上已达成深度共识，而菲律宾仍表现出不确定性，由美日主导的三边合作机制化将愈益深入地対菲律宾关涉台湾问题的角色和观点施加影响。近年来，随着三边合作走向机制化，菲律宾的涉台言论和实际行动已明显有所改变。^[2]未来，在美日推动下，菲律宾的涉台政策很可能构成小马科斯对阿基诺三世安全政策框架的最大突破之一。

此外，美日菲有意通过多层次多领域的机制化，使之能够经受政府和领导人的变动而持久发展。这包括有法律效力的条约的签订、政治层面下的官僚网络互动、立法部门对话和游说行政部门、美国智库引领的三边“二轨”讨论、深入到地方和社区层面的活动安排，以及与“志同道合”国家的紧密接触。因此，在美日菲三边峰会后，小马科斯表示，相信与美国达成的协议超越了政治范畴，即便政府换届，这些协议也将得到尊重。^[3]同样，2024年7月美菲“2+2”会谈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共同向菲律宾保证，无论谁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马尼拉都将继续获得美国两党的支持。^[4]8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率两党代表团也向菲律宾保证了美国的战略延续性。^[5]加之，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化鼓励日本分摊战略成本和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要旨与特朗普强调的“美国优先”理念正相契合。

然而，在中长期内，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化的推进势必面临一系列的制

[1] Robert Jervis,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1982, p.357; 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1982, p.380.

[2] “China Blasts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for Congratulating Taiwan Election Winner,” The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16, 2024, <https://apnews.com/article/china-philippines-taiwan-marcos-8f3b426f056d713a36b223300c083ae5>.

[3] “Marcos: No Plans for More EDCA Sites,” Philippine News Agency, April 15, 2024,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222643>.

[4] “Security Roadmap Inked; US Aid Assured Regardless of New President,” Philippine News Agency, July 30, 2024,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230128>.

[5] “Chairman McCaul Returns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Australia with Bipartisan Delegation,” US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August 22, 2024, <https://foreignaffairs.house.gov/press-release/chairman-mccaul-returns-from-the-philippines-and-australia-with-bipartisan-delegation/>.

约，从而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美日菲战略诉求和优先事项存在深刻分歧。其中，美日威慑的重心偏重中国台湾岛，而菲律宾侧重南海。尽管小马科斯政府不时关切“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但亦屡次坚称不允许将新增基地作为对台进攻的行动基地，而美国将愈益强调“共同防御义务是双向的”。^[1]可见，菲律宾的优先事项在于从美国的每一步战略推进中攫取最大的利益，以此加强国力和维护自身安全，并在“大国竞争”而非“大国战争”局面下获利。同样，美日间也存在美国“一体化指挥控制”与日本战略自主诉求的分歧。因此，日本否定“政府委托美军指挥自卫队”，并宣称根据国内法规对自卫队负有主要决策责任，“日本自卫队联合作战司令部将不受美军的指挥和控制”。^[2]显然，上述张力将影响三边机制的深度运行。

二是三国国内政治经济和不对称能力带来制约。随着三边合作机制化的深入，其将面临更多内部政治力量的质疑和反对，尤其是美国对自由贸易的政治顾虑，日本对相关法规的慎重考量，菲国内对“独立自主”和真正国家利益的深刻追求，以及彼此对他国内政外交变动的疑虑。例如，美国对菲军事援助和投资承诺，常常附加“须经国会批准”条件，而受限于当前的内政情况，其势必大打折扣。^[3]菲律宾实际经济情况亦使许多投资计划难以落地。^[4]相反，中菲之间的经济纽带是在适应菲国情的情况下经长期积淀而成，并非美日及联盟的侵蚀可以取代。^[5]同时，三边合作的“木桶效应”将日益浮现。

[1] “PBBM: EDCA Sites Won't Be Used for 'Offensive' Operations,” Philippine News Agency, April 10, 2023,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199094>.

[2] “Press Conference by Foreign Minister KAMIKAWA Yok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pril 16, 2024, https://www.mofa.go.jp/press/kaiken/kaikenwe_000001_00058.html.

[3] “US Shunning FTA Due to Domestic Politics; Nothing to Do with PH,” Philippine News Agency, May 31, 2024,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226006>.

[4] “US to Start Programming CHIPS Act Funds for PH,” Philippine News Agency, April 30, 2024,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223770>.

[5] 郑先武等：《“印太战略”下美菲同盟强化的动向与影响》，《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4期，第86-87页。

例如，美国对日菲的情报安全与网络安全能力及与之合作的潜在后果存有深刻疑虑，这并非朝夕可以解决，这些实际情况无疑将影响其集体决心。

三是域内多数国家将合力限制其战略成效。与菲律宾对“东南亚的兄弟们”会不顾原则支持菲方的希冀相反，新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倾向于在中美间保持平衡，甚至在不得不“选边站”时更多会选择中国。^[1]同样，印尼当选总统普拉博沃和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都已明确表示，海上争端必须在朋友之间进行协商，提倡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下解决分歧。^[2]东盟既有意推进其所认可的南海规则与规范，亦秉持共识性决策原则等“东盟方式”，强调东南亚和平、自由与中立等重要规范。就此，中国与东盟及成员国坚定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及共同珍视的区域规范，主动加强海洋合作和为此酌情探讨包括海警合作在内的新倡议，并考虑加强战略对接，^[3]势必将对域外大国主导小多边机制、推行排他性竞争，在功能和规范上形成有效的区域性制约。

四、结语

在美国主导下，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化不断推进，试图深化涵盖安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总体战略协调，从而长久地打造“印太战略”的新前沿。与“印太”作为地缘概念的特性一致，该三边机制有志于打造囊括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复合架构。^[4]应当看到，由于三国当前的国际安全和

[1] Sharon Seah et al.,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4 Survey Report,”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April 1, 2024,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4/03/The-State-of-SEA-2024.pdf>.

[2]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2024, Special Address,” June 1, 2024, <https://www.iiss.org/events/shangri-la-dialogue/shangri-la-dialogue-2024/plenary-sessions/special-address/>.

[3] 张洁：《东盟中心主义重构与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3期，第118-135页。

[4] 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第15-16页。

政权安全诉求存在一致性，双边联盟升级、三边合作机制化及与相关机制的联结，将呈现一个长期化态势，也是中国在亚太地区所面临的更为长久、严峻的军事和安全挑战。随着三边合作机制化向纵深发展，美国将进一步优化“岛链遏华”战略中的指挥、控制、军情、战备和保障结构；菲律宾将进一步融入“印太安全架构”并实施所谓“全面群岛防卫概念”；日本也将在重塑周边环境的同时进一步谋求“普通大国”和“军事大国”地位。^[1]在此过程中，三边合作机制化将试图促成南海协调性攻势的长期化、台岛“协防”守势的一体化、“三海联动”态势的常态化，甚至东盟南海议题的“印太化”，向中国强加外交、军事、经济和声誉成本。与此同时，三国在中长期内关于成本与责任分摊、战略自主性及优先事项的分歧，以及美国主导的“一体化”指挥控制系统与威慑战略的内在张力也将持续发酵，势必给三边合作机制化的深入推行带来不确定性。对此，中国宜放眼长远，坚定在南海维权的同时，统筹外交、经济、法律、传媒等手段，加强与东盟战略对接，维护好有利于民族复兴的外在环境。

【责任编辑：宁团辉】

[1] “Previewing the Japanese Official Visit and Trilateral Leaders’ Summit,” April 2,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reviewing-japanese-official-visit-and-trilateral-leaders-summit>.